

澳門初印象

林 瑩



與多年不見的中學好友相聚於夏季的佛山，一時興起，說到如今的珠港澳三地交通便利，便來了一場說走就走的澳門之行。從珠海的拱北口岸乘坐公交，一趟車的路程就來到澳門官也街——這條僅一百多米長，有着各式美食和地方手信的小街。

那是周六早晨的十點左右，官也街冷冷清清，店舖還沒開門，遊客也都沒到來。「這哪像什麼著名商業街啊。」友人感慨道。的確，和大多旅遊城市商業街相比，這裏的店舖早晨似乎過於懶散，不夠積極。我反而有些得意，小雨中在這條街上漫步，沒有過多遊客，還別有一番情調。

前後走了一圈後，店舖陸續開門。有人舉着大利來記豬扒包的牌子，指引我們去吃。豬扒包看上去非常簡單，在兩塊麵包中夾一塊豬扒。值得一試。因為麵包不差，豬扒香嫩。據說大利來記豬扒包是用老式柴爐烘製而成。爲了保證品質，店裏每天只會準備出產一爐的麵包原料，等到下午三點半準時出爐，出爐即賣。顯然，正如大多數緊跟時代的商家一樣，傳統早已被現代化取代。毋須等到下午三點半，任何時候，你都能吃上熱的豬扒包。而且麵包也更新了花式。除了最簡單的脆皮麵包外，還有法式酥皮可供選擇，價格也貴些。但要我說，還真是前者更好吃些。

話說豬扒包作為澳門特色的地方美食是不無道理的。葡萄牙殖民時期，帶來了大量的歐式麵包，結合本土口味，將生抽胡椒粉等醃製過後的豬扒油炸至金黃，組合成一道融合中西口味的地方特色食物。

在澳門，自然是少不了博彩和資本故事的。從威尼斯人，到澳門新地標新濠影匯，從事金融行業的友人如數家珍地和我講着它們背後始始人的資本故事，還堅持要帶我去坐8字形的摩天輪，儘管她已經感受過了。走在大名鼎鼎的威尼斯人裏，人造的天幕籠罩着行人——賭場、購物、吃喝、住宿都在這人造藍天白雲下進行，沒日沒夜。賭場裏走幾圈，沒有想像的赤裸裸金錢和欲望，有的只是標價了的籌碼和一張張普通的面龐。

那些在娛樂場裏工作的大多數澳門人和博彩遊戲裏的荷官們，他們太清楚賭博和生活的遊戲規則。對他們來說，賭場的工作不過是「搵食嗜」，生活不是人造天幕下的金碧輝煌，而像蓮花池的四季，夏去秋來，蓮花依舊出淤泥而不染。

那天夜裏回住處時，澳門電視台正在用粵語直播世界盃小組賽，德國對瑞典。德國隊最後幾十秒的絕殺，爲我們的澳門之夜增添了些起伏波動的、奇跡般地稍顯激動的回憶。這是關於一八年世界盃，也是關乎澳門這個城市，我們共同的一次回憶。

時隔月餘後寫下這篇澳門初印象，看着當時拍攝的照片，回味的卻是東方賭城別樣的人情滋味。

《三塊廣告牌》

怡 人



今年的奧斯卡獎的角逐之中，《三塊廣告牌》（港譯：《廣告牌殺人事件》）敗給《水形物語》（港譯：《忘形水》）無緣最佳影片，就連原本奪獎熱門的原創劇本獎項，也輸給了黑馬《逃出絕命鎮》（港譯：《訪、嚇》），令不少人都爲之嘆惋。在這個周末之前，我並無緣觀看此片，只知道它畢竟是得了多項提名的，總該是值得一看的。

觀影結束，不禁想要說說女主的性格，她是一個獨立的，不苟言笑的女人，她似乎沒有被世界善待過，也不懂得如何去愛自己身邊的人。女主的丈夫家暴她，女主選擇了離婚，學會了自己守護自己，還有她所愛的兩個孩子。或許正是這樣的經歷，讓她開始不再相信這個世界，不再相信自己會被世界所愛，所以她給自己穿上了盔甲，把自己的心鎖得嚴嚴實實，她變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

女主的世界在影片的前半段是悲慘的，她希望幫女兒討個公道，但是沒有人理解她，大家都把她當做了一個瘋女人。警察局的人用法律威脅她，教堂的神父在用一些荒唐的理論去說服她，牙醫在她看牙齒的時候直接上工具要拔她的牙，丈夫滿嘴的污言穢語去上門辱罵她，甚至自己的兒子都在勸她收手。她是孤獨的，她是大家眼中的異類。可是她不甘心，不甘心自己的女兒就這麼不明不白地死去，她內心一肚子怨言，卻不知道該去何處訴說，她給路過的小鹿訴說，給自己的兩隻拖鞋訴說——一個人如果沒有得到自己身邊人的愛，她是多麼的孤獨多麼的無助。

人，終究需要被身邊的人所愛，這樣才會讓我們這些渺小的人類有能力去愛其他人。死去的警長給了暴力的警員一封信，信中有着殷切的期望與支持，信中的鼓勵與支持讓暴力警官開始變得柔和，開始去愛身邊的人，他學着好好和自己的母親說話，開始認真地調查案子，他的改變也影響到了女主，女主因為有了他的鼓勵變得輕鬆，慢慢的，在影片的最後，當女主終於鼓起勇氣說出自己縱火的錯誤時，警官表示，其實自己早就知道了。女主笑了，她被世界善待了，那顆堅硬的心也開始變得柔軟……

電影源自生活又高於生活，在現實中亦不是所有案件都能真相大白，不是所有的公道都能歸還人間，不是所有的傷口都能愈合，不是所有的仇恨都能放下，但若是這所有的不好，都在旁人不斷的寬容、理解，和愛中慢慢在改變，我想，這個世界終將是和諧的。



很多人的家的味道，可能是媽媽的味道，在我們這兒，爸爸的味道也是很常見的事兒。若是童年父母做的飯實在不好吃，現在也能參加下父母做飯多難吃的話題，吐槽一下也很開心。

而我心中的家的味道，是我奶奶的味道。自我記事起，我吃的都是奶奶做的飯。用現在的話講，那時候的我是一個留守兒童。

夏天的時令早餐裏，我最愛吃的就是奶奶做的南瓜疙瘩湯。這南瓜疙瘩湯的名字是我長大後在網上看來的，我們那兒其實叫它南瓜麵老鼠的。我在網上看了，麵老鼠是



澳洲有個

原住民族的語言中沒有代表「左」、「右」的詞匯或概念，他們總用東南西北等方向詞來描述地點和方位。他們路上碰到，相互問候的第一句話偏偏總是：「你要去哪裏？」加州大學認知科學家布羅迪斯基（Lera Boroditsky）剛去調查研究時，很不習慣被「土著」當成連問候都回答不清的「傻子」。但一個星期後，她發現別人打招呼時，她的腦海裏會自動升起當地全景的俯瞰式微縮圖像，辨別方向、問候寒暄不再是問題。布羅迪斯基由此意識到：不但語言決定思想，而且人的認知能力潛力無窮，我們只要努力，就能改變思維定式，掌握不同的語言。



你在課堂上見過這樣的情景嗎：老師一絲不掛，用自己赤裸的身體作教材來給學生們講建築課？我作學生的時候沒遇到過這樣的老師，我作老師的時候也從未那樣對着學生。但德國和奧地利的大學生見過，那位敢脫敢做的老師名叫「百水」（Friedensreich Hundertwasser）。

百水是奧地利的「超自動主義」畫家。他自創了一套建築倫理學，把人的皮膚分爲三層，除了自身的皮膚之外，衣服和住宅是人的第二和第三層皮膚。爲了解說「皮膚」的特徵和權利，他在給大學生的演講中，一絲不掛地站在衆人面前，把自己當作「赤裸的建築」。

他認爲房屋如同皮膚，是居住者的一個文化身份。既然房屋是人的「皮膚」，那麼每個人便具有天生的權利來決定自己的房屋是什麼樣子。他批評現代工業化住宅缺乏人性，缺乏美感，缺乏快樂，因此需要藝術家來對城市和建築進行醫治和改造。

經過多年不懈的努力和呼籲，百水的理念逐漸地得到了社會的關注和回應。一九八三年，維也納市政府委託百水負責建造一座公屋，並以藝術家的名字命名。三年之後，百水在建築師克拉維納（Josef Krawina）和佩利肯（Peter Pelikan）的協助下，完成了他的第一個建築作品。

建築怎樣表達皮膚的權利？那年夏天去維也納時，我帶着許多問號特地去看百水的「皮膚」。離開繁華富貴的「中環」，離開所有的摩登大樓，我在市區外緣的僻靜角落，找到了藝術家的「第三層皮膚」——「百水公寓」。

這座建築與我在課堂上學的東西、與我在工作中做的東西完全不一樣！雖然「百水公寓」經過藝術家和建築師的精心設計，但它看上去就像是「沒有建築師的建築」，充滿孩童般的天真。一個個居住單位好像是村莊中的一座座小屋，五花八門，各自擁有自己的外形、顏色和風格，組成一個垂直的村莊。

爲了表示與理性主義建築的

說啥想啥

純 上

握不同的語言。

語言對實際生活的具體影響毋庸置疑。比如，語言中不分左、右可能會讓外國司機摸不着頭腦，也給軍人出操訓練帶來困難。又如，有些語言中沒有「七」這個數字，也會影響以此爲母語者學習數學的能力。但語言對思維的影響還有更多的微妙及重要之處。

翻開英文書，我們從左往右閱讀；讀阿拉伯或希伯來文的著述卻要從右向左。相應地，說英語者看圖講故事時會把圖片從左往右放，說阿拉伯或希伯來語者正好相反。兩者對時間、空間的構想顯然不同。英語強調事件的發生如何影響到人，西班牙語更關注引發事件的源頭。所以，英語中說「他把手臂摔折了」，西班牙語則會說「手臂被摔折了」。即，兩者對

赤裸的建築

方 元



▲維也納「百水公寓」

作者攝

決裂，「百水公寓」在設計上盡量避免和減少直線，沒有一支柱子是簡單的方形或圓柱形；屋頂高高低低、彎彎曲曲；外牆的分割線故意畫得歪歪扭扭，好像世界尚未發明直尺。百水認爲這樣的建築才能與大自然的形態和諧共處。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多姿多彩的窗戶。百水認爲每個居民應該有權利選擇自己喜愛的窗戶式樣，有權利按照自己的意願裝飾他的窗戶。因此，在「百水公寓」，每層的窗戶不是排列在同一水平線上，而是有上有下；每家的窗戶沒有統一的風格和標準，而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窗戶的外牆根據各個住戶的喜好而採用不同的面料。整座建築像是披着一件五彩的「百家衣」。

在「第三層皮膚」之外，百水還發展出第四和第五層「皮膚」。他在不同的樓層設置了公用平台和花園，爲居民的社交活動提供更多的共享空間，建立社區關係的「第四層皮膚」。他鼓勵居民在公寓各處平台上栽種樹木花草，讓樹枝、爬藤、花草從屋頂來、平台、窗口等各個地方生長出來，形成綠色的「第五層皮膚」。百水還鼓勵居民經常改變自家窗戶和外牆的式樣、色彩等等，讓「皮膚」不斷生長。

「百水公寓」與我們在香港看到的住宅樓很不同。百水痛恨那種好似一個模具造出來的工業

化住宅，批評它們是病態的房屋。在他看來，全是直線直角的現代建築是不道德的。爲何百水對理性主義建築如此厭惡？

如果了解百水的成長經歷，我們會發現他的藝術觀點與他的「半個猶太人」身份有關。一九二八年百水生於維也納一個貧困家庭。他的父親是雅利安人，母親是猶太人。在百水一歲的時候，父親便過世了，因此他與母親及母系親屬的關係非常親密。

正是他的猶太家庭背景，使百水早在少年時期就看到了皮膚與身份的關係。在他十一歲的時

候，維也納被納粹德軍佔領。他家的門上曾被塗上反猶口號，他的外祖母和八個親屬被送去猶太人集中營。但父親給他的「第一層皮膚」使他不但逃過了被送去集中營的命運，而且還讓他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而他的第二層皮膚——青年團的制服使他保護了母親的安全。在戰爭結束之前，由於他的半個猶太人皮膚被認爲不「純潔」，不能加入德軍上戰場，因而他又逃過了爲希特勒陪葬的命運。

大概因爲他在極權主義政權下生活的經歷，因此任何聲稱「純潔」、「理性」的東西都會令他產生一種本能的厭惡。而理性主義的現代建築確實有過一段被法西斯利用的不光彩歷史。所以，對於百水來說，反對理性主義建築不單是一個藝術問題，還是一個道德問題。

不過，理論與實踐總是有差距。儘管百水的理論在思想上比較深刻，但當他把理論搬到建築上應用時，就顯得比較膚淺。而建築也並非一層皮膚（或一張畫布）那樣簡單。作爲一個畫家，他對建築結構、建造技術等相關知識有一定的局限，因而限制了他的創作能力。在後來的幾個建築工程中，他的「皮膚」逐漸變成一種風格化的僵化模式，而不能像他希望的那樣不斷生長。

雖然百水未能把「皮膚革命」進行下去，但他的建築實驗讓我們重新審視建築與人、環境和社會的關係。他通過讓居住者參與設計和建造，賦予居民「再設計」的權利；通過人性化 and 個性化的設計，使居民擁有屬於他們自己的「皮膚」。他的設計表現了一個藝術家、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責任以及對大衆及弱勢群體的關懷。這是令我感受最深的一點。

「百水公寓」告訴我們一個被遺忘已久的道理：人們需要住宅不是爲了有個「蝸牛殼」睡覺，而是要有自己的身份和尊嚴，讓生活更美好。這是我們要去維也納看建築的一個好理由！

◀Dieter Zehentmayr 漫畫作品：百水和他的「百水公寓」

作者供圖

其實我一直想追溯到我媽和我爸的成長環境中去尋找原因，可惜我從沒見過我的外婆。我只知道我奶奶是一個會過日子的人。她精明能幹，能在下班的路上割草養兔子，能在周末坐火車去販土豆，既能掙錢也能攢錢辦事，而在吃這件事上絕不虧待自己。至於爲什麼注重吃，我從沒特意去問，現在也無處可問了。

我已經很久沒有吃過南瓜疙瘩湯了。○七年的秋天，爺爺走了，我就沒吃過了。爺爺走了的那年，奶奶就被接出了老屋，一直去年重病才回了家。老屋年久失修，天井裏的雜草都長了老長。門口的場邊菜園裏也是半人高的不知名植物，沒了奶奶的南瓜，也沒了我的太陽花。